

关联理论的认知修辞学说(上)

蒋 严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香港九龙)

提 要 本文在详细介绍关联理论的基础上,从基础修辞、创新修辞和文学描写修辞学三个方面讨论该理论的创新观点,从而展示关联理论在汉语修辞研究中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关联原则 语境效果 心力 语用推理

由法国学者 Dan Sperber 和英国学者 Deirdre Wilson 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创立的关联理论在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不但对语用学、语义学和认知科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在修辞学的研究领域也提出了许多新颖的看法。

关联理论与其他语用学理论的关键不同,在于该理论采用了认知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假设,就言语交际的规律提出了全新的定义和制约机制。通过研究言语交际中定识的加工和推演,关联理论提出用语境效果和心力之间的此消彼涨的关系来界定关联这个概念,提出了关联推定和交际关联原则。关联理论对各种语用意义的产生作出了独特的分析,也能对修辞、翻译和文学作品鉴赏这些高级交际现象提出认知解释。

1 关联理论的核心学说

我们先从基本概念出发,较详细地介绍关联理论的中心论点。^①

1.1 定识与认知语境

从关联理论的认知视角看,人的知识是以定识(*assumption*)的形式储存在记忆中的。所谓“定识”,就是被人当作现实世界表征的思想,与虚拟内容、愿望或表征的表征相对。定识可以通过知觉获得,也可以通过交际获得。虽然通过学习可以获得定识,但学习不是涉及知觉过程,就是涉及交际过程,所以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过程。至于定识的内容,它可以是百科知识,可以是特定文化社区的共享知识,可以是小圈子内几个人之间的共享知识,也可以是纯个人的经验和体会。^②在言语交际时,受讯者(*the audience*)^③是在认知语境中加工新语句(*utterance*)的。认知语境是一个由定识构成的集合,其成员来自上下文所构成的语言语境(*the co-text*)、即时话语场景(*situation of utterance*)所提供的非语言信息,以及受讯者为加工新语句而从记忆中调用的某些定识。显然,这种认知语境属于人的暂存记忆。

1.2 语境效果

新语句加入认知语境后,由它带来的新定识与语境中的旧定识互相作用,可能导致下述几种结果(有关定识用尖括号标示):

(一)对旧定识的增力:新定识使某个既有的不甚确定的定识变得更加确定。例如我原来仅凭磨砂玻璃上透出的灯光推断<张老师正在办公室里工作>。但这个定识并不十分可靠,

因为张老师可能正在教学楼上上课但却没有关掉办公室里的灯。现在有同学来告诉我 <她刚刚在张老师的办公室里与他谈完论文>。这句话所传达的新定识便可以为我原有的定识 <张老师正在办公室里工作> 增力。

(二)抵触并替换旧定识:新定识与某个既有的定识互相矛盾。由于新定识更加可信,它便替换了旧有定识,后者于是从记忆中被抹去,与其相关的其他定识也会得到相应的调整,或是被删除,或是在力度上得到削弱。例如我原先从一本书里读到 <“题邸间壁”这首诗为唐朝郑谷所作>,可后来从网上的论坛讨论中却得知 <“题邸间壁”的作者为宋代的郑会>,因为我觉得后者更加可信,所以就接受了后一种说法。

(三)逻辑蕴涵——新旧定识结合推出新结论:新定识与某个既有定识构成演绎推理的两个前提,从中推出了新的结论,也就是更加新的定识。例如香港的教育机构一般都规定 <如果八号或以上台风讯号生效时,所有课堂教学及考试均自动取消>。这个既有定识属于社区的共享知识。如果我从电视里看到 <现在八号台风讯号已经生效>,那么我就可以把上述新旧两个定识当作前提,运用肯定前件规则推出 <所有课堂教学及考试均自动取消> 这个结论。

这三种结果在关联理论中被称为正面语境效果 (positive contextual effects), 与之相对的是两种负面语境效果 (negative contextual effects):

(四)新定识的力度弱于既有的某个旧定识,前者虽然支持后者,但却无法起到增力的作用。例如我既已从气象报告中得知 <三号台风讯号已升级为八号讯号>,如果有同事告诉我 <恐怕三号台风讯号很快会升级为八号>,那么这个新信息并不能完善我的知识境界。

(五)新定识与某个旧定识相互抵触,因前者的力度弱于后者,所以遭到摒弃。例如我知道 <布隆菲尔德与萨丕尔两人分别写过《语言论》且中译本都可以预订>,可书店店员硬说我记得错了—— <只有一种萨丕尔的《语言论》,别人没有写过同名的书>。因为我确信自己比店员有更丰富的语言学专业知识,所以我仍然坚信自己原有的定识而排斥店员表达的新定识。

那么,能带来正面语境效果的交际似乎比仅能带来负面语境效果的交际更成功。但这种说法还不是周全的考虑。我们可以设想到其他一些可能:

(六)作为(四)的延伸讨论,新定识虽然在力度上弱于既有的某个旧定识,可它为什么非要与这个定识相比较呢? 它会不会与其他定识相联系,从而达成增力或其他正面语境效果呢? 显然,不穷尽所有的组合就无法断然否定这种可能,除非我们能够论证新定识只应该跟某个特定的旧定识相联系。

(七)同理,作为(五)的延伸讨论,新定识虽然与某个旧定识相抵触且弱于后者,但是它有没有可能与其他定识相联系并从总体上达成正面的语境效果? 这个问题的答案同(六)。

(八)新定识是否会与语境中的任何旧定识都不发生作用,即不产生任何语境效果? 如果限定语境中旧定识的数量,这种情况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但语境是受讯者选出来的,具有流动性。如果受讯者无法从自己构筑的认知语境中得到语境效果,他可以扩大认知语境,从记忆中调用其他定识与新定识结合,一直到获得语境效果为止。更进一步说,如果交际的目的不但是获得语境效果,而且是获得正面语境效果,那么受讯者也可以不断尝试,直到达到目的为止。可是,从起初的无语境效果,到不断扩大认知语境而可能获得的多个效果,什么时候应该适可而止? 再说,构成初始语境的定识集合是如何选出的? 如果选得恰当,不就能立即得出所需要的语境效果而无需继续搜索了? 这个问题我们在 1.5 节继续讨论。

1.3 信息的加工

广义的信息加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语句的加工,从中得到语境效果也就是语句的恰当

解释。它以表征的形式得到储存。另一类是对非语言信息的加工，如通过知觉得到定识或是对表征作进一步思考推理而得到的定识，从中得到认知效果 (cognitive effects)，也以表征的形式得到储存。除了这种因语言信息和非语言信息的区别而导致的语境效果和认知效果的区分，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加工系统，那就是输入系统 (input system) 和中枢加工系统 (central processing system)。输入系统是分工明确的、为单一对象服务的局域系统。每个输入系统只负责处理一种内容，如视觉或听觉，或是语言的解码，后者可以再分为语音到词义的解码系统和语法分析解码系统。中枢加工系统接受各个输入系统的输出表征，并对它们进行综合加工^④，通过演绎推理，得出新的结论。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言语理解的两个阶段，一是解码，二是推理。解码是输入系统所从事的工作，得到的结果是语句本义的大致逻辑式。由于人际交际是高度经济跳跃的，所以通过解码得到的语句本义或多或少都是欠明确的 (underdetermined)，而且它可能引发的引申意义或转义也有待表征。这种不完整的逻辑式在其后的中枢加工过程中参照认知语境中的相关定识，经过推理完善而成为完整的本义即显义 (explicature) 和高层显义 (higher – level explicature) 即命题态度 (propositional attitude)^⑤，还与相关定识结合并推演出其他可能的语用意义，如预设 (presupposition) 和寓义 (implicature)，其中包含了一些修辞格的运用。下面我们举一些例子来加以说明：

- (1)a. 老王那天在宴会上喝多了。
 - b. 老王在八月一日晚上在酒席上喝××酒喝醉了。
- (2)a. 你真聪明！
 - b. 你真糊涂！
- (3)a. 你怎么才来上班啊！
 - b. 你早就该来上班了。
- (4)a. 这个申请人还有上升空间。
 - b. 这个申请人资历尚浅，(所以这次不能提拔他当院长)。

(1a) 的不完整的本义经过充实成为 (1b) 那样的显义。(1a) 说的一定是喝酒，绝不能理解为“喝多了可乐”，尽管在其他场合有可能这么解读，比如在争破吉尼斯记录时。而且这里的“多”只是相对于老王本人而言是过量，对一个酒量更好的人来说可能并不算多。老王还必须是喝醉了，尽管原文并没有用“醉”这个字眼。(1a) 里的具体时间和事件的细节也需要结合语境才能补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显义是语用推理作用于解码意义的结果。

(2a) 到 (2b) 是个确定命题态度的过程，在这个例子里是“讽刺”而不是“夸奖”。(3a) 这个反问句里传达了 (3b) 这样的预设。而 (4a) 这个委婉说法在具体语境中传达了 (4b) 这个寓义。这些意义在原句中都没有明确地得到表达，而是语用推理作用于显义的结果。

根据上述讨论我们还可以划出关联理论视角下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界限：解码得到的意义是语义学研究的对象，而推理得到的意义则是语用学研究的对象。许多语言理论认为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分界在于前者研究真值条件义而后者考察非真值条件义，但既然作为真值条件义的显义的获得也涉及语用推理，那么语用学就介入了真值条件义的刻画。^⑥

1.4 心力

语境效果只是认知在加工语言信息时所涉及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人必须为此而付出的脑力，关联理论把这方面的因素称作“加工努力”(processing effort)，作为一种更汉化的译法，我们把它译作“心力”。另外，为求指称上的便利，我们在下文中有时也把语境效果简称为“语效”。为了获得认知效果，一个人通常愿意付出大量的心力，甚至是投入毕生的时间和精

力去研究一个学术问题。就是这样,也难以保证一定能得到所期望的认知效果,因为思考的问题可能异常困难,当事人也可能能力不逮:相对论肯定不是人人都能提出的,就是一个本科学位也不是人人都能念得下来的。况且研究的认知客体并不是参照人的信息加工规律而度身定制的,不会主动助人去解决问题。与之相对的是,一个人绝对不会愿意为获得语境效果而付出大量的心力。言语交际具有瞬时性,母语使用者一听到话语就会马上理解语句的内容,不会为理解语句的本义或语用义而频频长考,从而使交际陷于停顿,否则言语交际就不会成为人人愿意从事的高频率行为。在多数书面语阅读的场合也是如此。因此,对于日常的言语交际活动,不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的理解,受讯者都理所当然地期望用最少的心力来达成语句的理解。另外,语言是人说出来的,与其他的认知客体有着根本的区别。讯递者(the communicator)^⑦说话的目的是要传递信息,而且交际双方都熟悉使用中的语言系统,所以说出来的语句会协助受讯者去理解其显在及隐性的意义,因此也不需要受讯者付出过多的心力。所以,为言语理解所付出的心力是非常经济的,而为其他认知行为所付出的心力可以是不计成本的。

心力的计算无法精确到具体的数值,但能从总体的角度加以衡量,所以仍然可以计算相对值,使得以同类客体为对象的认知行为在心力的消耗上具有可比性。假如为了加工某个认知客体 a,只需要沿用既有的认知语境 c,而加工另一个认知客体 b 则需要调用记忆中的其他定识以扩大语境 c,那么在其他因素维持不变的前提下,加工 b 时付出的心力 e2 必定要大于加工 a 时所付出的心力 e1。在加工语言信息时,心力的付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解码的层次,输入系统加工信息得出语句的表征,这当然要耗费心力;一是在中枢加工时,通过对认知语境的扩大和对相关定识的组合推理而得出新的结论。寓义的推演就是最好的例子。又如,复合命题式的解读涉及一个以上的命题和逻辑算子,所以在加工时也需要一定的推演,需要付出更多的心力。有时结构过于复杂的语句因涉及过多的心力又没有得到相应的语效,就难免让人觉得困惑,如(5b)和(6b)这两个涉及多重否定的例子:^⑧

- (5)a. 未必不会长得青枝绿叶。
 - b. ?未必不会不长得青枝绿叶。
- (6)a. 李相得弗要忒开心奥。(上海话里意为“玩得非常开心”)
 - b. ?李相得弗要忒弗开心奥。“(玩得非常不开心”。)

1.5 交际的关联

既然语境效果的获得需要消耗心力,而言语交际又具有瞬时性,所以尽管一个定识在动态的认知语境中可以导致的语效有多个,甚至多到无法穷尽,受讯者却不会单纯地以获得尽量多的语效为交际目的,因为那样做就有可能消耗过量的心力,占用过多的时间。受讯者真正追求的是具有关联的解释。所谓关联,就是语境效果与加工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加工一个定识所带来的语效越多,定识的关联度就越高;加工时付出的心力越多,关联度就越低。这么说并不是在支持省力原则。心力的付出应该与获得的语效成正比,多一分心力,就应该有多一分的语效。修辞用法需要较多心力加工,但也能带来更多语效,所以不会削弱语句的关联度。

关联理论认为,在解码而得出定识的原子命题时,所付出的心力应该忽略不计,因为这是理解的前提,属于正常的消耗,否则谁也不愿交际了。而且解码过程是自动的、无意识的,不会消耗多少心力。真正需要斟酌的是用于推理的心力。在定识加工过程中,假如能够确定以最小心力获得的最大语效,那么这种解释应该是具有最大关联的解释。但这种解释是难以得到的,因为最大的语效意味着受讯者必须穷尽所有的语效并把每个语效与付出的相应心力一一匹配,再把所有配对作全盘比较后才能确定最大关联。这在时间上是不允许的,会浪费过多心

力,在逻辑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新得到的定识又会带来更多的定识,没有穷尽的时候。

因此,交际双方实际达成的是优化关联,也就是语效与心力的合理平衡。关联理论进而提出了交际关联原则和优化关联推定:

交际关联原则(the Communica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每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传递了一个推定,推定自己达到了优化关联。

优化关联推定(the Presumption of Optimal Relevance)

(a)相关语句有足够关联,值得受讯者付出心力去加以处理。

(b)相关语句是与讯递者能力和偏好相匹配的最关联信号。

优化关联推定告诉我们,受讯者之所以愿意加工接收到的语句,是因为他觉得从中可以得到一定的语境效果。如果他付出适当的心力得到了语境效果,他就自认为这是讯递者能够传递的最为关联的信号。这个想法只是一个推定,但除此之外,他无从知道其他的可能。从讯递者的角度看,她知道受讯者无法完全确认她的意图^⑨,如果她想让他弄懂她的意思,她就应该尽自己的能力,按她对受讯者的知识程度的理解,在不违背自己的语言使用偏好的条件下把话说清楚。她当然可以故意把话说得不明不白,但那样就不能期望对方能听懂她的意思。所以交际双方唯一的共识只是交际关联原则:从明示的交际行为推定该行为具有优化关联。这个原则可以解释交际为什么可以成功,当然它也不能保证交际每一次都能成功。误解总是有可能出现的,因为讯递者可能错误地估计了受讯者的知识状态;受讯者也可能错误地估计了讯递者的措辞能力及其使用语言的偏好。但这种错误并不能证伪关联原则:交际本来就有失误,交际双方最多只能揣测对方的意图和意思,所以关联理论认为交际从本质上说就不是合作的行为,这与格莱斯的以合作原则为基础的语用理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在交际关联原则的制约下,受讯者只要得到第一个有关联的解释就能认定它就是具有优化关联的解释。这是因为在每个交际场合,受讯者在认知语境中的定识都是以可及性的高低大小而有序地排列的。第一个用来与新定识组合推演的,应该就是最能导致优化关联的定识,而讯递者也会做如是判断。所以受讯者得到了第一种解释之后就无需再试图推出其他解释了。讯递者也有可能说些让受讯者难以理解的话,如莫名其妙的感叹、脑筋急转弯、谜语等。但那样就不再是单纯的言语交际,还涉及了问题求解这种认知活动,所以受讯者的加工过程就是一种有别于言语理解的认知行为。关联理论认为,制约这种认知活动的不是交际关联原则,而是认知关联原则:

认知关联原则(the Cogni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人的认知倾向于追求最大关联。

问题的求解一般只有单一的答案,需要从最大关联的角度加以思考才有可能成功。就算一个人付出了极大的心力,也完全有可能永远解不出难如“无边落木萧萧下”那样的字谜。

不管是认知关联原则还是交际关联原则,它们都是中枢加工系统的工作原则,是制约人的认知思维活动的内隐规律。人不需要有意识地去学习它们,甚至根本不会意识到它们的存在,通常也不会意识到认知加工活动所占用的时间,可又无一例外地受其制约。与此相关的是,人在言语理解时所采用的主要是非论证型推理(non-demonstrative inference):受讯者根据讯递者明示行为所提供的依据而构建一个可以确认但难以证明的定识。^⑩这种推理是自发的,也是内隐的,当事人自己不会意识到这个过程的发生。

2 关联理论的语用分析

关联理论的核心学说首先能对一些公认的语用现象作出新颖的解释。倡导关联理论的学者认为这种解释比其他语用理论所提供的解释更加周全充分，更加具有心理现实性和逻辑上的可推导性，还能解释其他理论无法解释的许多语言现象和用法。

2.1 程序意义与编码意义

自然语言的意义可从多个角度加以分类。前面我们提到过真值条件义 (truth - conditional meaning) 和非真值条件义 (non - truth - conditional meaning)；语义学考察的意义 (semantic meaning) 和语用意义 (pragmatic meaning)；编码意义 (encoded meaning) 和推理意义 (inferential meaning)。关联理论进一步提出，编码意义可以再分成两种：概念意义 (conceptual meaning) 和程序意义 (procedural meaning)。概念意义所编载的是词语的概念型内容，程序意义能触发相关的语用推理或制约其推理的方向。^①这两种意义有时会混合编载在同一个词语里，例如英语的“but”的概念意义是“加和”，而其程序意义是让受讯者知道如何加工“but”后面的命题，该命题的内容会超出受讯者的预想，从而与“but”之前的命题构成转折或对照关系。再如汉语的“都”这个词的概念意义是“将谓词的性质分配给关联对象的每个成员”。它的程序意义是“向左搜寻显性的关联对象或是构建预设并从中确定隐性的关联对象”。^②

2.2 对基本语用现象的解释

我们现在大致勾勒一下关联理论对1.3节提到的几种语用意义的解释方案。详细的分析需要参考实时语境，就每个具体语句作出翔实的刻画和解释，这在一篇文章里是难以做到的。

字面义的获得需要借助语境信息完成一个或多个操作：1) 指称指派 (reference assignment)：为代词和时间副词确定具体的指称对象；2) 其他充盈 (saturation) 过程：补出省略的句子成分和句法上不需要但在语义理解上必要的成分；3) 丰义 (enrichment)：意义的进一步精细化，如补充隐含的逻辑关系、深化某些词语的意义等；4) 解歧 (disambiguation)：选定歧义语句在具体语境的单一意义。在关联理论中，这些操作的结果被称为“显义”(explicature)，而相应的操作过程有时也称作“显谓”(explicating)。显谓的基础在于语句编码的概念意义，藉此可以参照认知语境补全语句的命题意义。指称指派和充盈需要参照语境信息而完成，但语法因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丰义和解歧更需要由语境信息来决定。显谓的作用不只是修残补阙，产生合法的句子，更在于从意义上完善语句。有时句子已经相当完整，但意义依然欠明确，所以仍然需要显谓。显谓的过程当然要受交际关联原则的制约，这样才能得出确定的解读。特别是什么时候扩展的意义对交际来说已经足够充分，可以就此停下，这也是由关联原则决定的。实际上，在交际关联原则的制约下，受讯者得出的第一个解释就是充分显谓的结果，根本不会意识到其他显谓可能的存在，尽管我们从纸上谈兵的角度可以分析出多种可能的结果。

预设 (presupposition) 是为语句的词语或结构所触发而由听者逆向推理得出的、由言者认定为既成事实的命题。预设不是语句明确说出的内容，那是断言 (assertion) 的内容，而是某个词语或结构所编载的程序意义触发的。这种预设触发机制引导我们按某种语义框架去构建一个预设。如“连……都”引导我们去构建一个有关梯级模型的预设，其中一组命题按某种标准有序排列，而包含出现在“连”与“都”之间的成分的命题在梯级模型中与其他命题构成一种衍推关系。预设的具体内容，要根据特定语境和语句，在交际关联原则的指引下推导得出。^③

我们这里所说的寓义是为语句的字面义所暗含的、由听者顺向推理得出的命题。这种命题在形式上与相关语句所使用的句子毫无相似之处，不需要什么触发词语或结构就能表达，但有些词语的程序意义也可以指引受讯者从某个角度去发掘寓义。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看，受讯者之所以要发掘寓义，是因为字面义无法让他得到具有优化关联的解释。但寓义的发掘可以是个无穷无尽的过程，因为寓义可以有不止一个。有的语句所表达的寓义相对确定，但有的语句可以表达涟漪叠叠的弱寓义，无法枚举。诗歌就是典型的例子。其结果是造成一种强烈的诗意图。哪种场合需要发掘哪种寓义，或者说哪种寓义值得发掘，发掘到什么阶段，这都是受交际关联原则所制约的。一旦确定了关联理论所起的关键作用，实际操作就比我们的理论设想更为直截了当了：受讯者只需要把第一个有关联的解释当作优化关联的解释，根本无需考虑还有其他的什么寓义值得玩味，否则就又卷入了解题般的认知活动，与言语理解无关。

命题态度是指人持有及表达某个命题的具体方式，如相信、打算、愿望、需求、担心等。换一个角度看，交际中的每个语句都传递了对其承载的命题的不同态度。有些时候命题态度通过具体的语调、虚词或语法结构这些程序性编码信息来标示，如汉语中用升调、“吗”或“A - 非 - A”结构表疑问，或借助高阶谓词这种概念性编码信息来表达更为丰富多样的态度，如怀疑、遗憾、抱歉、假装等。然而，在许多缺乏明显标记的情况下，命题态度需要通过语用推理才能充实得到，而且不充实就无法理解确切的命题态度。有些命题态度可以从基本态度推导得出，如从“断言 p”可以推出“知道 p”和“相信 p”。事实上每个语句都表达了命题态度，对每个语句的理解都涉及将相关的命题纳入正确的态度模式，这往往又是语用推理的结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命题态度的理解和确定是解读语句字面义的关键过程。在关联理论中，命题态度又被称为高层显义 (higher - level explicature)，因为字面义自身的命题义是基层显义，而命题态度是对基层显义作进一步的显谓所得到的结果，就像是把基层显义当作初级子句，而在该子句之上又用上层谓词来对其述谓，可记为：说话人 V(p)。其中 p 为子句命题即基层显义，V 代表上层谓词如断言、吩咐、命令、质疑、保证、宣布、声明、怀疑、预计等等。图式中的划线部分有时是真正说出的，也有时是通过语用推理而充实得到的。这种语用推理的依据可以是某些程序性编码信息，也可以完全是语境因素。只有在交际关联原则的制约下，受讯者才能高效地直接推出恰当的命题态度。

在任何语境中，一个语句都必须具有显义和高层显义；在某些语境中，语句又可以具有一个或多个预设或寓义，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有时言者真正意图表达的内容并不是显义，而是寓义或是相反的意义如反语用法。更重要的是，语句所表达的各种命题意义都是欠明的，都需要借助语用推理来充实，有些意义在本质上就是隐晦暗含的曲言，无法用直义代替，也无法完全用明确的语句来澄清，那样做的后果往往会导致语义的部分流失，其中以弱寓义为甚。这种表达上的取舍当然是在总体关联的角度做出的，受交际关联原则的制约。

以上讨论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对各种语用意义的理解作了粗粒型的刻画，更具体的解释需要就个别例子详细描写和讨论。一旦确定关联在相关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余下的讨论就只是细节上的相对琐碎的描写了，因为关联理论已从理论性的高度提供了一整套解释机制。

也有不能用关联来解释的现象，比如说谎、言不由衷、身势语言等。说谎和言不由衷都掩盖了讯递者的真实意图，所以发出的语言信号不具有明示 (ostensive) 性质，而关联原则只能涵盖明示的语言信号。身势语言的编码信息过于模糊，无法通过解码而得出确定的意义，更遑论从中进一步推出语用意义了。

3 关联理论与基础修辞研究

我们这里所谓的“基础修辞”就是陈望道先生提出的消极修辞(陈望道,1932),即着眼于语言运用的抽象的、概念的角度,用平匀、严密的形式,使表达的内容明确、通顺,没有模糊和歧解,也没有意义理解上的隔阂。基础修辞作为语辞的记述、表现和揉合三境界的底子,是言语交际行为的根本,最具实用价值。基础修辞也是各级学校语文教育的主题,尽管教学双方现在更熟悉的往往是“提高交际能力/表达能力/语文能力”这种与消极修辞名异实同的新说法。

对汉语基础修辞的研究,既有的文献积累了较多的用例并作了详细的评点,也注意探讨有效的研究方法。这些成果同时又把理论解释的任务摆上了研究议程。系统充分的理论解释可以深化评点的效果,使其更具有客观性和全局性,而不至给人以就事论事、随文评点和偏重规范(*prescriptive*)的印象。作为一种解释上的理论选择,我们认为关联理论可以直接应用于基础修辞研究,为后者提供一种理论框架。语用学理论本来就是研究交际行为的,侧重研究言语交际成功的充要条件,回答人为什么能够在言语交际中不为意义的表面阙失所惑,高效而又轻而易举地传递信息、互相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关联理论研究的这种交际达成的现象涵盖了基础修辞要求交际者达到的效果;关联理论所考察的基本语用现象涵盖了基础修辞的现象;关联理论所提供的解释可以直接应用于基础修辞现象的解释。

从关联理论的认知角度看,正确的遣词造句能充分反映讯递者的意图,让受讯者得到具有优化关联的解释。不恰当的措辞会使讯递者辞不达意,结果或造成意义的阙失,或传达了讯递者意图之外的额外信息,或误导受讯者作出不正确的推理,导致交际失误或完全失败。基础修辞的关键在于对词语和结构的准确使用,使它们表达意向中的概念编码意义并传达所需的程序编码意义。基础修辞研究的任务是解释具体词语和结构的编码意义会以何种方式去影响受讯者的解码和进一步的语用推理,从而构建出最终的语义解释。更具体地说,在利用动态追溯方法作同义对比分析时,可指出新旧修辞文本所能产生的不同语境效果,并就相应的心力付出作出估算和比较,在辨析语义意义和语用意义的基础上对文本措辞的优劣作出理性的评价和科学客观的解释。这样,具体的修辞分析就能在关联理论的总体框架中得到统摄和整合。在文章评改和演讲评判的场合都可以采用类似的策略,用关联理论的概念和机制加以分析解释。相同的方法还可以应用于更广义的语文听说读写训练,为中小学语文教学、对外汉语教学、汉语水平考试和汉语阅读和速读研究服务。此外,不同的文体和不同题材的文本具有各自达成总体关联的方式,也可以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加以研究、分析和解释。

我们还想谈谈推理语用学与辞规研究的关系。关联理论对基础修辞研究的贡献是从意义理解的角度入手的,进而又对意义的准确表达提出了语用上的要求。这种做法可以与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辞规研究互相补充。吴士文、胡习之等学者创立的几十个辞规是对消极修辞研究的重要发展,^①不但充实了消极修辞的内容,还对汉语语篇的形式分析作了开拓性的贡献。基础修辞既可以从意义理解的角度去考察,又可从辞规这个语篇形式的角度去研究,而修改病句则是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之中。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看,辞规研究是对编码信息的研究,是语用推理的前提和出发点,关联理论也可以对辞规的使用提供语义——语用上的阐释。(待续)

注释:

①详见 Sperber & Wilson (1995)一到三章和后记。本讨论考虑到了一些误解和不实指责,作了有针对性的

解释。这些解释有些属本文作者自己的理解和演绎，不一定为关联理论的其他研究者认可。

②参见 Clark (1996) 第四章和 Sperber & Wilson (1995) 第三章第五节。

③一般译为“受者”、“受众”。

④这个理论由 Fodor (1983) 提出并为关联理论所接受。

⑤显义是关联理论的原创概念，详见蒋严 (2005) 的介绍。

⑥详见 Carston (2002)。

⑦用“讯递”来译 communicate 是许国璋先生的提议。之所以不把 the communicator 译为“交际者”是因为“交际者”在汉语里一般包含了交际双方。

⑧另见 George Orwell 在其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一文中批评过的一个因滥用否定而难以解读的例子：“I am not, indeed, sure, whether it is not true to say that the Milton who once seemed not unlike a seventeenth-century Shelley had not become, out of an experience ever more bitter in each year, more alien [sic] to the founder of that Jesuit sect which nothing could induce him to tolerate.” (Orwell 2006: 4)

⑨为了指称方便，我们遵从 Sperber & Wilson (1995) 的做法，把讯递者称作“她”，把受讯者称作“他”。

⑩参见蒋严 (2002) 的详细讨论。

⑪参见 Blakemore (1987)、Wilson & Sperber (1993) 和 Espinal (1996)。

⑫参见蒋严 (1998)。

⑬参见蒋严 (1998；即出)。

⑭参见胡习之 (2002) 的综述。

参考文献：

- [1]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年新 3 版, 1932 年初版.
- [2] 胡习之. 辞规的理论与实践: 二十世纪后期的汉语消极修辞学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 [3] 蒋严. 梯级模型与“都”的语义刻画 [A]. 程工 (主编) 语言的形式和功能 — 庆祝徐烈炯教授七十华诞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即出.
- [4] 蒋严. 语用推理与“都”的句法/语义特征 [A]. 现代外语 1998, (1), 10–24. 严辰松、高航(主编)语用学 [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460–486.
- [5] 蒋严. 论语用推理的逻辑属性 – 形式语用学初探 [J]. 外国语 2002, (3): 18–29.
- [6] 蒋严. 形式语用学与显义学说 – 兼谈显谓与汉语配价研究的关系 [A]. 刘丹青 (主编) 语言学前沿与汉语研究 [C].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143–170.
- [7] 李维琦、黎千驹. 现代汉语实践修辞学 [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8] 李维琦、王玉堂、王大年、李运富. 古汉语同义修辞 [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 [9] Blakemore, Diane. Semantic Constraints on Relevance [M]. Oxford: Blackwell, 1987.
- [10] Carston, Robyn. Thoughts and Utterances: the Pragmatics of Explicit Communication [M]. Oxford: Blackwell, 2002.
- [11] Clark, Herbert. Using Language [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2] Espinal, Teresa. On the Semantic Content of Lexical Items within Linguistic Theory [J]. Linguistics 1996: 109–131.
- [13] Fodor, Jerry. The Modularity of Mind [M]. The MIT Press, 1983. 心理模块性 [M]. 李丽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14] Orwell, George.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A]. 政治与英语 [C], 郭妍俪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英汉对照版, 2006.
- [15] Sperber, Dan. and Deirdre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First edition 1986, Second edition 1995. 关联: 交际与认知 [M], 蒋严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即出.
- [16] Wilson, Deirdre. and Dan Sperber. Linguistic Form and Relevance [J]. Lingua 1993 [1/2]: 1–25.